

「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

葉高樹**

摘 要

建立清朝而且統治中國長達兩百六十八年的「滿族」，他們如何「漢化」或是否「漢化」的問題，一直都是清史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也分別提出各種不同的解釋模式。然而，誰是「滿族」？哪些人「漢化」了？他們「漢化」的情形如何？似有釐清的必要。所謂的「滿族」，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中國社會中，已被視為是「旗人」的同義詞；在近年的清史研究中，也逐漸形成等同於「旗人」的共識。基於此，有關「滿族漢化」的研究，必須考慮八旗成員的族群屬性，滿洲、蒙古、漢軍三大族群對漢文化的態度，應加以區分；此外，駐防地區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不同，區域差異也會影響其「漢化」的速度。又過去的研究常將旗人視為一個群體，但這個群體至少可以分為上層的皇族、中層的文武官員，以及下層的兵丁，不同階層的成員受漢文化影響或衝擊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未必可以一概而論。是以對於不同族群、不同階層的「滿族漢化」現象，究竟是普遍情形還是個別差異，似乎可以重新思考。研究者或許可以透過若干不同族群、不同階層的個案討論，逐一進行檢視，當累積到相當成果之後，才能將「滿族漢化」的概念具體化，或是得到比較準確的認知。

關鍵詞：滿族、漢化、旗人、八旗

* 收稿日期：2010年6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10月14日。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 言

非漢民族與漢民族的互動，是構成中國歷史的重要一環。當非漢民族進入漢民族固有的生活領域建立政權，雖然漢民族在政治上必須屈服於非漢民族，但是在文化上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強調「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或是高唱「宋亡而中國不亡」的論調，¹進而認為非漢民族征服者在漢地居住一段時間之後，必定會朝向「華化」或「漢化」的方向演進。歷史上非漢民族統治中國期間，是否曾經出現「漢化」現象，是研究上的重要課題，至於建立清朝而且統治中國長達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他們是否「漢化」或如何「漢化」的問題，一直都是清史研究者所關心的，也先後提出同化、征服王朝、涵化等各種解釋模式，以及晚近從族群理論切入所提出的滿洲中心的觀點。不論採取哪一種角度，學者最後都聚焦在兩方面：一、清朝統治中國成功的原因；二、清朝統治對現代中國的影響，這也是引發探究「滿族漢化」此一議題的重要因素。²

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清史學者逐漸建構出一個概念：滿族入主中國之後，因與漢族接觸頻繁而出現「漢化」現象，並隨著時間程度日益加深。大體而言，雍正、乾隆年間是滿族質變的關鍵時期，經過統治者的大力整飭，卻因成效不彰，以致「漢化」的速度變本加厲，終至無法挽回。縱使今日已經難以追查出此一觀點的源頭，但可以確定的是，1960年代的學者提出：早期滿洲統治者有系統的採行「漢化」政策，使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³以

¹ 例如：明遺民面對滿洲入主中國的現實，將「亡國」與「亡天下」、「治統」與「道統」加以區分，或寄望於「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同一時期的貳臣，則藉由元朝統治下漢文化大放異彩的論辯，推翻「宋亡而中國亡」之說，用以否定「明亡而中國亡」。參見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收入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頁67-95。

² 參見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36（2006年12月），頁155-165。

³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February 1967), pp. 191-193.

及滿、漢民族已經從「文化的同化」進入到「民族的融合」的程度，⁴這些見解對後繼的研究者產生深刻的影響。迨 1990 年代，美國清史學者對長期主導清史解釋的「漢化」觀點進行檢討，⁵反對「滿族漢化」的說法，認為即便清朝統治者接受漢族的統治標準與儒家正統，仍然保持著滿族與漢族之間的差異，清楚地劃分滿、漢之間的界線，也強調直到清末，滿族仍有強烈的族群意識，⁶進而帶動「新清史」的研究熱潮。⁷然而，「新清史」的學者似乎未能檢視嘉慶朝以後滿族面對漢文化的衝擊與回應。⁸

關於「漢化」一詞的定義，在研究上一直未能形成共識。清朝統治者在滿、漢民族互動的過程中，已經察覺滿族逐漸受到漢文化影響的現象，稱之為「沾染漢人習俗」。⁹所謂的「漢人習俗」，最初並無價值判斷的意味，通常也用在相對於滿洲傳統的場合，而滿洲傳統則包括清語、騎射、淳樸等特質。然而當漢文化的作用力日益增強，甚至危及滿洲傳統的維持，統治者便將滿族清語荒疏、騎射廢弛、背離淳樸等病象，歸咎於「沾染漢人習俗」所致；又將淳樸的內涵擴大解釋為敬天、法祖、忠君、尚武精神、勇於任事等，亦即指一切好的品德與行為而言，進而對「漢俗」採取全面否定與批判的態度。¹⁰有關研究

⁴ 參見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上冊（1968 年 10 月），頁 276-277。

⁵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November 1996), pp. 829-850.

⁶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35. 另參見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

〈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87-90。

⁷ 參見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台北），卷 24 期 2（2006 年 12 月），頁 2-15。

⁸ 參見劉世珣，〈評介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耘》，期 14（2010 年 6 月），頁 187-189。

⁹ [清] 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 413，卷 4，頁 101，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類似的說法另有：「入漢俗」，見《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84，頁 3，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條；「漸染漢習」，見《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15，頁 3，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條；「效漢人習氣」，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485，頁 15，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條。

¹⁰ 參見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收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上所謂「滿族漢化」的概念，以當時的用語，即是「沾染漢俗」。

若將「滿族漢化」的研究成果約略劃分，大致可以歸納為現象的探討與政策的解析兩大類。在現象的探討方面，包括子弟命名、族譜纂修、習俗變化等，¹¹大多認為滿族已經出現「漢化」的傾向。在政策的解析方面，透過考察統治者推行具有漢文化特徵的種種政策，或認為是直接利用，¹²或主張係理性選擇，¹³或強調乃策略運用，¹⁴所以統治者既展現出儒家的姿態，又禁止族人沾染漢俗、拋棄傳統。至於過去十幾年來有關「滿族漢化」的爭論，主要就是集中在統治政策上的討論，¹⁵只看結果，自然是接受「漢化」；只講動機，則又可以推論出滿洲統治者存有抵制漢文化的意識。然而，誰是「滿族」？哪些人「漢化」了？他們「漢化」的情形如何？這些問題在研究上似乎還沒有完全被界定與釐清。

二、「滿族」的定義問題

清末，朝廷面對國內日益激化的族群對立，試圖推動准許滿、漢通婚，任官不分滿、漢，旗人編入民籍，以及司法上一體對待等消弭滿、漢畛域的措

歷史系編，《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7），頁 249-273。

- ¹¹ 例如：莊吉發，〈從數目名字的演變看清代滿族的漢化〉，收入氏著，《清史論集（六）》（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 41-69；莊吉發，〈參漢酌金——從家譜的纂修論清代滿族文化的變遷與適應〉，收入氏著，《清史論集（十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頁 38-56；陳捷先，〈清代滿族婚俗漢化略考〉，《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期 15（1990年 12 月），頁 207-215。
- ¹² 參見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上冊，頁 255-279；管東貴，〈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3 本第 3 分（1971 年 11 月），頁 445-488。
- ¹³ 參見陳捷先，〈從清初中央建置看滿洲漢化〉，收入氏著，《清史論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 134-135。
- ¹⁴ 參見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清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24-33；歐立德，〈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87-93。
- ¹⁵ 參見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入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頁 80-81。

施，¹⁶希望從政治、法律、社會各個層面來化解滿、漢衝突。由於旗人擁有政治、經濟、社會的特權，構成與民人身分待遇上的差異，也是長期以來造成社會族群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所謂消弭滿、漢民族畛域，就當時的狀況而言，也可以說是消弭旗、民畛域，因為社會上早已流傳「不分滿漢，但問旗民」的說法。¹⁷民國建立以後，旗人失去以往的種種優勢，在社會歧視與輿論壓力之下，旗人刻意隱藏身分，紛紛更改姓名、籍貫，向民國政府申請改隸民籍，以漢人的身分在社會謀生，¹⁸使得滿、漢，或者說是旗、民的界線已經無法清楚地區別。根據民國初年以來的民族調查與文獻記載，「滿」與「旗」這兩個名詞，基本上成爲可以互相替換的概念。¹⁹從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中期，有關旗人的人口資料，呈現下滑的趨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歷次的人口普查中，由人民自行申報爲「滿族」的人數，則出現快速增加的現象，其中約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數，是由於恢復或改正民族成分而來的。²⁰在中國的現代的民族識別中，「旗人」與「滿族」兩者之間完全可以畫上等號。

所謂「旗人」，是由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所組成，蒙古、漢軍與滿洲同樣被編在八旗制度之中，相對於民人而言，都享有與八旗滿洲同等的地位。所謂「滿族」，是以女真族系爲主體，結合蒙古族、漢族，一小部份朝鮮族，²¹以及極少數的俄羅斯人、維吾爾族、藏族等，²²由諸多民族共同組成的

¹⁶ 參見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頁28-32。

¹⁷ 《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遼寧省編輯委員會編，《滿族社會歷史調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頁81。

¹⁸ 參見戴迎華，〈冠姓、更名、改籍與民初旗民身份變化〉，《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10期5（2008年9月），頁51-55。

¹⁹ 參見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頁216-217。

²⁰ 參見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程〉，頁220-221、223。

²¹ 參見徐凱，〈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內高麗姓氏〉，《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2000年第5期，頁62-73。

²² 俄羅斯人、維吾爾族、藏族分別編入八旗滿洲的鑲黃、正白、正黃三旗，各自成立一個佐領。分見鐵保等奉敕纂修，《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664，卷3，〈旗分志·八旗佐領三·鑲黃旗滿洲佐領下〉，頁11；同書，卷7，〈旗分志·八旗佐領七·正白旗滿洲佐領下〉，頁35；同書，卷5，〈旗分志·八旗佐領五·正黃旗滿洲佐領下〉，頁12。

民族共同體，他們因為制度的因素，也都成為「旗人」。1981年，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中的幾個問題〉一文，²³引述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一則上諭，曰：

向來定例，滿洲殺死滿洲例文，本未妥協，自應以旗人殺死旗人，載入例條，則蒙古、漢軍皆可包括，況此例不過嚴禁旗人相殺之意，……試思八旗俱有蒙古、漢軍，豈蒙古、漢軍獨非旗人？而滿洲殺死蒙古、漢軍，竟可毋庸抵償，如是異視，豈公道乎？²⁴

認為凡被編置在八旗之下的人們，無論滿洲、蒙古、漢軍，都是旗人，也都是「滿族」的成員，這是最早對「旗人」就是「滿族」進行論證的研究；王氏在1983年發表的〈「國語騎射」與滿族的發展〉，²⁵則再次申論此一觀點。王鍾翰將歷史上的「旗人」與「滿族」或「滿洲人」畫上等號，在1980-1990年代中國的清史研究中，有著見仁見智的看法，²⁶但是此說的影響力卻持續擴散中。1990年代後期，美國的「新清史」學者也逐漸形成類似的見解，²⁷至今「旗人」等同於「滿族」的說法，幾乎成為研究上的新共識。

若同意「旗人」就是「滿族」或「滿洲人」，則必須釐清此一事實出現的時間。王鍾翰的態度較為謹慎，舉出最早的例證是成書於乾隆九年(1744)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官方已經將蒙古、尼堪（*nikan*，漢人）姓氏列入。²⁸在有

²³ 參見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中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29-136。

²⁴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434，頁4，乾隆五十八年八月甲子條。

²⁵ 參見王鍾翰，〈「國語騎射」與滿族的發展〉，《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1982年第2期，頁22-28。

²⁶ 相關的研究史討論，參見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程》，頁12-18。

²⁷ R. Kent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 (February 2002), pp. 151-164.

²⁸ 參見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33。關於《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錄八旗滿洲的姓氏問題，有兩點必須略加說明：一、姓氏收錄的標準，據清高宗敕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瀋陽：遼瀋書社，1989），〈凡例〉，頁4-5，滿洲姓氏不以八旗滿洲為限，蒙古、漢軍中有滿洲姓氏者，仍應列入；蒙古、高麗、尼堪姓氏，則僅限於隸屬於滿洲旗分者，惟入關後始編入滿洲旗分或具有「阿哈」（*aha*，奴僕）身分者，則不列入。二、查閱書中附載滿洲旗分內的蒙古、高麗、尼堪姓氏人等事蹟，其中的蒙古以及大多數的高麗、尼堪，都具有「包衣」（*booi*，家中奴僕）身分，則書中認定的非女真族系的滿洲人，是指特定對象而言。王氏在文中另舉乾隆朝中期以後編纂的《滿洲名臣傳》為例，立傳對象涵蓋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則「旗人」等同於「滿洲」的意識極為明確。又關於滿文

關「滿族」形成時間的相關研究中，目前主流的意見認為，皇太極在天聰九年(1635)定族稱為「滿洲」開始，所謂的「滿族」，就是以女真人為主體，為征服、統治中國而透過八旗制度組織起來的一群人。²⁹皇太極在定族稱的汗諭中，曰：

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³⁰

諭中提到的「國」，《舊滿洲檔·天聰九年》寫作「*gūrun*」，³¹此字有「國」、「部落」、「人們」等意，對皇太極而言，即是指他統治下的人。再對照皇太極描述天聰年間的勢力範圍，曰：

自東北海濱〔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濱〔貝加爾湖〕，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幹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蒙古大元及朝鮮國，悉入版圖。³²

其中的族群則包括使犬的赫哲族、使鹿的鄂倫春族、產狐貂的索倫部（達斡爾族與鄂溫克族），以及蒙古族、朝鮮族乃至漢族。

其次，由於各民族歸附及編入八旗的時間不同，而有「佛滿洲」(*fe manju*，

「*nikan*」一詞的涵義，有學者主張並非單指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初期的漢族後裔，尼堪相對於世居吉林、與遼東有經常性商業往來的女真人而言，是對「遼東人」的泛稱，他們具有說漢語，從事農耕或貿易活動，或居住在城鎮裡的文化特徵，其中有相當一部份是融入遼東社會的女真人或朝鮮人，參見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著，常書紅譯，〈八旗漢軍的起源與內涵新見〉，收入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輯7，頁314。

²⁹ 關於「滿族」形成時間的說法，除天聰九年(1635)說之外，另有：一、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齊創製滿文；二、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齊建國稱汗；三、清崇德七年(1642)，皇太極大致完成東北的統一；四、清末，因為在十九世紀之前的清朝並無民族意義上的「滿族」。相關的研究史討論，參見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程》，頁2-12。

³⁰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5，頁19-20，天聰九年十月庚寅條。

³¹ 神田信夫、松村潤、岡田英弘譯註，《舊滿洲檔·天聰九年》（東京：東洋文庫，1975），冊2，頁318，天聰九年十月十三日。老滿文「*gūrun*」，新滿文寫作「*gurun*」。

³²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61，頁3，崇德七年六月辛丑條。

舊滿洲)、「伊徹滿洲」(*ice manju*, 新滿洲)之分。在關外時期,凡於努爾哈齊時代與皇太極天聰年間編入八旗者,稱「佛滿洲」;皇太極崇德年間始入旗者,則為「伊徹滿洲」。入關之後,凡在外關已經入旗者,稱「佛滿洲」;順、康年間陸續編入者,則為「伊徹滿洲」。³³又入關之後的「伊徹滿洲」,另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伊徹滿洲」是指康熙初年再度用兵黑龍江流域,將被征服的赫哲、虎爾哈諸部納入八旗;廣義的「伊徹滿洲」,則可包括順治初年歸順而入旗的明朝官兵。³⁴無論如何,從「佛滿洲」、「伊徹滿洲」名稱的出現來看,只要被納入八旗組織者,就是民族共同體的一分子,也都是「滿族」的成員。

天聰九年固然是界定「滿族」身分的重要的時間點,惟從八旗制度與族稱兩方面進行思考,似乎還有向前追溯的空間。努爾哈齊創建八旗制度之初,已將轄下的蒙古人散編在各旗,漢人則集中編入黃旗。迨皇太極時代,因歸附的蒙古族增多,遂將旗下的舊蒙古人抽出與之混編,在蒙古完成擴編之後,才有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之分。至於旗下的漢人,亦即天聰年間所謂的舊漢兵,大約在天聰五至七年(1631-1633)間,始漸次擴展為「烏真超哈」(*ujen cooha*),也就是順治十七年(1660)訂定漢文名稱的八旗漢軍。又滿語中「諸申」(*jušen*)一詞,原指女真人而言,即便皇太極否認其族稱為「諸申」,實際上「諸申」在《滿文老檔》中頻繁出現在自稱或他稱的場合;值得注意的是,《滿文老檔》中的「諸申」另可用來稱呼「屬民」、「夷人」,並衍生出「滿洲奴僕」的涵義。³⁵其中,「夷人」為散居在黑龍江、松花江流域的小民族的泛稱,也就是

³³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滿洲原起〉,頁2。另參見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31-132。

³⁴ 由於東北少數民族入旗或編為佐領的過程頗為複雜,各家的說法不一,相關的研究,參見鹿智鈞,〈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研究的回顧與討論〉,《史耘》,期14(2010年6月),頁147-150。

³⁵ 參見滕紹箴,〈「滿洲」名稱考述〉,《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頁71-72。滕氏根據《滿文老檔》的記載指出,「*jušen*」一詞共出現二百餘次,有「族稱」、「屬民」、「夷人」三種用法,用作「族稱」者,約佔四分之三;用於「屬民」者,約佔四分之一,但只在女真族內部使用,天聰年間稱所屬的蒙古人、漢人也以「*jušen*」代用。另努爾哈齊、皇太極時代,將俘虜編為奴隸,大批被擄獲的「*jušen*」地位下降,遂衍生出「滿洲奴僕」的意義。

明朝所謂的「野人女真」；「滿洲奴僕」是指在政權擴張之後，包括女真人在內被分配給貴族役使的俘虜、罪犯；比較特別的是「屬民」，係努爾哈齊、皇太極統治下的人，有女真、蒙古以及漢人。因此，在努爾哈齊勢力發展的過程中，轄下人眾最初並無彼此之分，隨著政權逐漸成長、形成民族共同體之後，才透過八旗制度將這群人組織起來，使之成為政權的核心成員。其後，皇太極所謂的「滿洲」，原先也沒有嚴格區分入旗與否，惟在征服戰爭不斷進行中，原本兼具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功能的八旗制度，開始朝向專業化的軍事組織演進，於是按照入旗的時間區分「佛滿洲」、「伊徹滿洲」。進入八旗制度的各族成員，遂成為鞏固滿洲政權的根本。

以往對於「滿族漢化」的討論，一直都沒有明確地界定「滿族」的指涉對象，或是將之限定於女真族系的成員。³⁶事實上，「滿族」的定義，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都沒有改變過，在清朝稱之為「滿洲」，「滿洲人」是「旗人」，「旗人」就是「滿洲人」。

三、「漢化」的族群問題

當「滿族」被定義為「旗人」，討論「滿族」是否「漢化」時，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三大族群都應該包括在內。率先將「滿族」與「旗人」畫上等號的王鍾翰，特別強調漢軍旗人在出旗為民之前，語言、服飾、信仰、習俗各方面，都受到相當程度的「滿化」的影響。同樣地，由於滿洲、漢軍長期接觸，滿洲也受到「漢化」的影響；不過，王氏卻又指出八旗蒙古則一貫保持自己的語言、習俗和民族情感。³⁷換言之，討論「滿族漢化」，大可將八旗蒙古排除在外，而以往的研究也都沒有觸及這一課題。惟就既有的認知而言，八

³⁶ 例如：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上冊，頁255-279；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頁24-33。

³⁷ 參見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33。

旗漢軍的民族成分自然是漢族，即便被編入八旗，其原有的漢文化特質仍不至消失殆盡，一旦與漢人頻繁接觸之後，縱使已經「滿化」，大概更無法避免漢文化的衝擊。例如，康熙朝前期，漢軍荒廢騎射的情況已頗為嚴重，遇有都統、副都統出缺，竟因「急切難得其人」，必須改用滿洲補授，康熙皇帝不禁感嘆，曰：「從前漢軍人材壯健，騎射亦優，與滿洲相去無幾。近日漢軍漸以庸懦，皆似綠旗。」³⁸事實上，不僅八旗漢軍如此，八旗滿洲也面臨相同的考驗，雍正皇帝即指出，「滿洲本性，原以淳樸儉約為尚」，卻因「漸染漢人習俗，互相倣倣，以致諸凡用度皆涉奢靡，不識撙節之道，罔顧生計。」³⁹因此，八旗蒙古的情形頗值得重新考慮。

近年來，學者透過對清代翰林院成員的分析，以及對《清代硃卷集成》的研究，發掘出若干八旗蒙古的科舉世家，他們面對漢文化的反應，也漸為研究者注意。⁴⁰例如：內務府正黃旗蒙古伍堯氏，從雍正朝到道光朝，五代之中，列名的男性人數三十二人，就有三名進士、四名舉人、六名生員；其中以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恩科進士法式善最著，歷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庫全書》分校、《永樂大典》館提調官、《實錄》館纂修、《熙朝雅頌集》總辦、《詞林典故》總纂等職。⁴¹正藍旗蒙古阿魯特氏崇綺，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一甲一名進士，史稱「立國二百數十年，滿、蒙人試漢文獲授修撰者，止崇綺一人，士論榮之」，⁴²並以精研性理聞名於當時。⁴³八旗蒙古成員能在競爭激烈的科

³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213，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條。

³⁹ 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13，卷 4，頁 101，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⁴⁰ 參見邱永君，《清代滿蒙翰林群體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張杰，《清代科舉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張杰，〈清代八旗滿蒙科舉世家述論〉，《滿族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37-39。有關八旗蒙古「漢化」的討論，約有二篇，參見張杰，〈清代尚賢硃卷所見蒙古旗人的社會生活〉，《清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頁 35-39；張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漢化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 38 期 5（2006 年 9 月），頁 3-7。

⁴¹ 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冊 16，〈來秀〉，頁 67-77。

⁴²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國史館，1986），卷 475，〈崇綺傳〉，頁 10727。

舉考試脫穎而出，必須具備相當的漢文化素養，而出現世代從事舉業的家族，甚至有名重一時的學者。由此可見，要深入瞭解這類情形，則不能忽略八旗蒙古「漢化」的研究。

其次，順治朝初期以來，國家為八旗子弟廣設學校，教授清語、騎射、繙譯等科目。其中繙譯一項，是以清、漢文繙譯為主，蒙古子弟則另教以清、蒙文繙譯，而兩者都是用儒家典籍滿文譯本作為教材。自雍正元年(1723)開始，又有專為旗人設置的繙譯科考試，也是以滿文本儒家典籍為範圍。⁴⁴旗學教育的推動，既有培養子弟「文武兼備，以儲實用」的意義；⁴⁵繙譯科目的學習，又有教導子弟「兼通滿、漢，足充任用」的作用；⁴⁶繙譯科考的實施，則為子弟另闢入仕的途徑，且不致妨害清語、騎射等民族傳統技能的保持。惟八旗子弟在學校學科學習的內容，其實與一般讀書的民人相同，都是研讀代表漢文化精神的儒家典籍，遂不免出現「習漢書，入漢俗」的現象，⁴⁷漢軍如此，滿洲如此，蒙古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個和族群有關的問題，則是清軍入關後在天下各地設置駐防所造成的影響。東北係龍興之地，入關之後，由於皇帝移駐北京，京師成為旗人的新故鄉。大量的旗人集中在此地以拱衛政權，加以皇帝的嚴密監督，滿族出現「漢化」的速度與範圍，較為緩和或較不明顯，反倒是宗室王公、八旗高官們的日常喜好，帶動北京地區的流行風尚。⁴⁸然而，為了統治上的需要，又將八旗勁旅派往天下各地駐防，他們是否能夠堅持滿洲傳統，則面臨嚴峻的考驗。駐防制度理論上類似「出差」，⁴⁹在關外時期原有三年輪調的規定，入關後因幅員

⁴³ 徐珂編著，《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8，〈性理類·八旗學派〉，頁3791。

⁴⁴ 關於各類旗學的開辦、招收對象、教育內容，以及繙譯科考試的設置、考試範圍、名額規定等，參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357-359、375-379、396-400。

⁴⁵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16，頁9，順治二年五月戊戌條。

⁴⁶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90，頁6，順治十二年三月丙申條。

⁴⁷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84，頁3，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條。

⁴⁸ 參見賴惠敏，〈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故宮學術季刊》（台北），卷21期1（2003年9月），頁102-129。

⁴⁹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21，頁2，雍正十年七月乙酉

廣大不易實施而停止，以致八旗兵丁出現附著於駐防地的現象。⁵⁰為維繫散佈各地的八旗勁旅對政權的向心力，統治者諭令駐防官兵「凡有老病致仕退甲，及已故官兵家口，俱令回京」，「若置立產業、墳塋，遂同土著，殊屬不合」，亦嚴行禁止。⁵¹即便如此，當旗人在漢地居之漸久，「沾染漢俗」也就在所難免。

各個駐防地人員的派遣，少者數百至千餘人，多者不過五、六千人，連同家屬，大約五千至二、三萬人。⁵²以少量的旗人投入巨量的漢人社會，雖然採取建立滿營或滿城的隔離政策，但是要一直保持良好的清語、騎射的能力，以及淳樸的生活特質，有實際上的困難，因為很難抵擋漢文化高度物質文明的滲透與誘惑，剩下來的只是「沾染漢俗」的快慢、深淺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駐防旗人族群出現「漢化」的現象，與駐防的地區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在要求駐防將領應為兵、民表率的上諭中指出：「西安官兵，尚有滿洲舊制，杭州駐防滿兵，漸習漢俗。」⁵³杭州為經濟發達、人文薈萃的地區，自然對旗人產生莫大的吸引力，惟兵丁所沾染者，在皇帝看來盡是「陋俗」，「日打馬吊為戲，不整容束帶而鞞履行者甚多」。⁵⁴駐防長城一帶的八旗蒙古，被認為民族傳統保持得較完整，而雍正年間在北京成長的蒙古子弟，非但清語生疏，據內閣侍讀學士舒魯克指出，會蒙古話者亦少，即便有心學習，卻因罕有通曉蒙古文經書而能教授之人，在缺乏學習管道的情形下，亦多半途而廢。⁵⁵這兩個例子說明了所謂「滿族漢化」，存在著族群、區

條，曰：「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

50 參見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頁191；潘洪鋼，〈由客居到土著——清代駐防八旗的民族關係問題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2006年第1期，頁79。

51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15，頁3，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條。

52 參見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31-52、61-94。

53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11，頁28，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戊午條。

5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頁1069，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條。

5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輯32，頁155-156，〈內閣侍讀學士舒魯克·奏陳八旗蒙古子弟學蒙文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域的差異問題。

又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皇帝降旨斥責漢軍，曰：

近者漢軍居父母之喪，親朋聚會，演劇飲酒，呼盧鬪牌，儼如筵宴，毫無居喪之體。至孝服鞍轡等類，所用素帛皆異常華美。……居喪演劇，滿洲所無，漢人亦未有，特漢軍為然耳。⁵⁶

惟「居喪演劇」一事，根據乾隆朝河南道監察御史鄒一桂的調查，實係源自漢人社會，在雍正年間已經不分滿、漢，無論旗、民，「有力者踵事增華，無力者亦效尤竭蹶，間有儉樸從事者，親朋輩即以不孝譏之」。⁵⁷這類傷風敗俗行為的發生，最初指向漢軍的生活腐化所致，迨釐清之後，當然是歸咎於「沾染漢俗」。影響所及，舉凡旗人有喝酒賭博、服用僭越、縱情聲色等偏差行為，都被皇帝視為「漢化」的結果。⁵⁸

四、「漢化」的階層問題

當「滿族」一詞可以指女真族系的成員，也可以指八旗的成員時，則「滿族」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惟以往有關「滿族漢化」的研究，常將他們視為一個群體。⁵⁹事實上，就旗人或八旗統治集團而言，不同階層的成員對漢文化的態度，以及受漢文化的衝擊、影響的程度，應該有所不同，至少可以分為上層的愛新覺羅家族（包括宗室王公、姻親貴戚），中層的文武官員，以及下層披甲當差的兵丁。據《異辭錄》所言，曰：

⁵⁶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31，頁 19，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庚午條。

⁵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輯 25，頁 374，〈協理河南道監察御史鄒一桂·奏陳請禁民間喪葬陋習以端風化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⁵⁸ 參見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2（2004 年 6 月），頁 110-117。

⁵⁹ 例如：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此書大約是目前對「滿族」與漢文化互動較有系統討論的專著，書中便是以「八旗子弟」一詞作為代表。

滿人不求文學，惟重騎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諸險要，畫地而居，不與居民雜處，不與漢人聯姻，備之未嘗不周。然二百年間，滿人悉歸化於漢俗，數百萬之眾僉為變相之漢人。並其文字語言為立國之精神，……滿人乃自棄之。皇帝典學，尚知國語，餘則自王公大臣以下僉不知其為何物矣。⁶⁰

反映出「滿族」成員對本身的文化認知，或對漢文化的態度，有上、下之間的落差。若從身分或階層的角度來看，最基層的八旗兵丁，尤其是駐防在南方各省者，他們與漢人接觸頻繁，大約也是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最深的一群。但是，這方面的資料極為零散而不易掌握，難以具體呈現他們質變的情形，往往只能透過皇帝上諭的訓斥略有了解，至於對象、區域也無從考察，是研究上最難處理的。⁶¹

相對於兵丁，位居最上層的皇帝，理論上應是滿洲傳統最堅定的維護者，然自康熙皇帝以降，諸帝自幼即接受完整的漢文化教育，實無法避免將漢文化內化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一部份。例如：女真、蒙古原有火葬後撿骨掩埋的習俗，入關後受漢人的影響而逐漸改為土葬，⁶²唯有「遠鄉貧乏之人，不能扶柩回里，因而攜骨歸葬」。江南道監察御史常祿向乾隆皇帝密奏，「今旗人祖宗墳墓俱在附近地方，何必復行火化，殘毀親屍，乃以習慣成俗，相沿不知其非，揆諸仁孝之心，實屬未協」，而有「禁止旗俗火化」之請。⁶³乾隆皇帝特為解釋火葬舊俗的由來，並頒布〈旗民喪葬禁令〉，諭曰：

本朝肇跡關東，以師兵為營衛，遷徙無常。遇父母之喪，棄之不忍，攜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隨身捧持，聊以遂其不忍相離之願，非得已也。

⁶⁰ [清]劉體仁，《異辭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卷4，〈亡國滅種之利器〉，頁225。

⁶¹ 有關駐防基層兵丁及其眷屬生活情形的研究，目前似僅見賴惠敏，〈從杭州滿城看清代的滿漢關係〉，《兩岸發展史研究·明清史專號》，期5（2008年6月），頁69-79。

⁶² 參見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頁253-254。

⁶³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輯25，頁299，〈掌江南道監察御史常祿·奏請飭禁旗俗火化親屍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自定鼎以來，八旗、蒙古各有寧居，祖宗墟墓，悉隸鄉土，喪葬可依古以盡禮。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此狃於沿習之舊，而不思當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嗣後除遠鄉貧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攜骨歸葬者，姑聽不禁外，其餘一概不許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長及佐領等隱匿不報，一併處分。⁶⁴

事實上，入關初期的順治皇帝及其后妃也多採用火化。⁶⁵乾隆皇帝將民族傳統解釋為不得已的權宜措施，卻將推行「漢俗」視為是「依古以盡禮」。

又北方民族普遍有收繼婚的社會習俗，滿洲入關後雖以法律的方式加以禁絕，但對婦女改嫁的行為則不加限制，然因朝廷對八旗官兵的孀婦、孤兒訂有賑濟措施，從而衍生出旗人寡婦守節的問題。按雍正五年(1727)議定：「寡婦若有子嗣，或年至四十，及有養贍之人者，仍令參領、佐領處具保，俾得一年之半俸錢糧米石」；若有不符規定而實係情願守節者，由族人及其母家會同該佐領等具保呈明，照例給與。⁶⁶乾隆皇帝繼位之初，正紅旗滿洲都統王常卻在奏摺中強調，滿洲舊俗以寡婦改嫁為恥，欲守節者竟須經由該旗奏陳，殊不合理，應改為凡情願守節者，即不計年歲、無論子嗣，均給予半俸。⁶⁷「滿族」對寡婦守節的要求與對節烈婦女的旌表，實係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以及沿習明制而來，且隨著時間的演進，此種道德上的訴求與行為上的表揚不斷地被強化。⁶⁸乾隆皇帝既未對王常所謂滿洲舊俗的說法加以駁斥，且准其所請，⁶⁹顯然是同意甚至變相鼓勵旗人婦女守節。因此，皇帝在推動各種與漢文化相關的政策時，縱然不是以「漢化」為目的，但在精神、生活層面，其實也不可避免

⁶⁴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頁22-23，雍正十三年十月乙酉條。

⁶⁵ 參見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頁254。

⁶⁶ 允祿等奉敕編，《上諭旗務議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雍正五年〉，頁15-16，上諭，八旗大臣等議覆，奏於雍正五年九月十七日，奉旨依議。

⁶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32輯，頁57-60，〈正紅旗滿洲都統王常·奏請按舊例發半薪給八旗官兵遺孤〉，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⁶⁸ 參見定宜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7-31、37-38、125-148。

⁶⁹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6，頁1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巳條。

地沾染了若干漢人習俗。當他們一面崇尚漢人的倫理價值，一面又禁止八旗人等「沾染漢俗」，不免造成族人認知上的混淆。

愛新覺羅家族的成員，包括皇子、宗室、覺羅（*gioro*，清制，以顯祖宣皇帝塔克世本支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為「覺羅」）等，分別在上書房、宗學、覺羅學接受清語、騎射的教育，並有定期的考核，應能保持較佳的民族特質；他們也有兼通滿、漢的必要，故安排有學習漢文的課程。⁷⁰影響所及，皇族率皆具備一定的漢文化素養，其中亦不乏儒學造詣深厚者，而以舒爾哈齊四世孫簡儀親王德沛最著。⁷¹惟皇族在讀漢書的同時，不免會妨礙滿文的閱讀能力或學習意願。例如：嘉慶十八年(1813)夏至，皇帝傳諭宗人府知會慶郡王永璘於某日前往視察牲禮，永璘因清文生疏，將滿文的「視牲」誤認作「陪祀」而未到場，遭罰郡王俸一年的處分；⁷²嘉慶二十四年(1819)，舉行宗室繙譯會考，參加的人數竟然只有九人，究其原因，則在於宗室子弟「平時惟習漢文，竟不以繙譯為先務」。⁷³

至於具有官員身分的旗人，因為留存的資料較為豐富，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個別的差異性，卻又呈現出其中的複雜性。這些擁有政治、經濟優勢地位的官員，大都已經改變了滿洲原有的淳樸的生活習慣，但是清語、騎射的能力是否也隨之荒疏，則因人而異。清初，旗人在國家教育與選才政策的鼓勵下，子弟「專心學文，以致武備廢弛」，⁷⁴且「漸習漢語，竟忘滿語」。⁷⁵在這股旗

⁷⁰ 關於上書房教育，參見郭松義、李新達、李尚英，《清帝列傳·清朝典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 20-23；關於宗學、覺羅學，參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371、373-374。

⁷¹ 〔清〕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冊 1 卷 2，〈宗室下·簡儀親王德沛碑·袁枚撰〉，頁 34-36，曰：「王宅心遊目，恒在三代上，入學謁聖，必摩挲其俎豆鐘簋，懷而慕思，不忍訣捨。……常詣成均，講《大學》，橋門俯聽者千餘人，皆悅服。……王所著：有《周易解》八卷，《實踐錄》二卷。」

⁷²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69，頁 15-16，嘉慶十八年五月丙戌條。

⁷³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56，頁 5，嘉慶二十四年四月丁丑條。

⁷⁴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63，頁 16，康熙十五年十月己巳條。

⁷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頁 93，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條。

人投身讀書的熱潮中，一批出身八旗官學或科舉考試而跟隨在康熙皇帝身邊的侍讀、侍講學士，都通曉滿文、深諳儒術、長於繙譯，並為皇帝纂輯經史書籍。⁷⁶他們的文化素養深厚，至於騎射技能，例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皇帝在瀛臺教諸皇子射箭，進士出身的徐元夢(舒穆祿氏，正白旗)因「不能挽強」，為皇帝痛斥，並遭重罰；⁷⁷對照同一時期在上書房行走的顧八代(伊爾根覺羅氏，鑲黃旗)，卻是「力能挽十二石弓，矢不虛發」，⁷⁸以「善射」知名，⁷⁹其中實涉及個人對文化的取捨。

歷經康熙朝八旗群體面臨質變的衝擊，降及雍、乾年間，皇帝厲行整飭旗務，對旗人的清語、騎射的能力，淳樸的生活習性皆有要求；⁸⁰尤其乾隆皇帝銳意開邊，亟需擢用能參贊軍務的八旗官員，加以為保持軍事行動的機密性，章奏常須以滿文書寫，⁸¹非清語、騎射俱佳者，實難勝任。雖然乾隆皇帝屢次在上諭中嚴斥旗人「將緊要技藝全行廢棄不習，因循懦弱，竟與漢人無異」，⁸²但是在此一時期猶將才輩出，故得成就「十全武功」。當時深受乾隆皇帝重用的旗員，如傅恒(富察氏，鑲黃旗)、阿桂(章佳氏，正藍旗)、舒赫德(舒穆祿氏，正白旗)等，皆非行伍出身，而是來自官員世家，他們經由八旗官學或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復因家庭的庇蔭，得以快速升遷，通過戰場歷練之後，在朝中躋身高位。這批具備「出將入相」才能的官員，從「出將」說明其清語、騎射與尚武精神並未廢懈，由「入相」反映出擁有相當的文化素養，且在漢文

⁷⁶ 相關的人物及其事蹟，參見〔清〕鄂爾泰等修，李洵、趙德貴點校，《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卷 236，〈儒林傳上〉，頁 5331-5334；同書，卷 237，〈儒林傳下〉，頁 5336-5349。

⁷⁷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卷 296，〈徐元夢傳〉，頁 8820。

⁷⁸ 〔清〕鄂爾泰等修，李洵、趙德貴點校，《八旗通志·初集》，卷 237，〈儒林傳下·顧八代〉，頁 5336。

⁷⁹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卷 275，〈顧八代傳〉，頁 8601。

⁸⁰ 參見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2，頁 92-10、110-117；葉高樹，〈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8（2007 年 12 月），頁 95-106、128-139。

⁸¹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88，頁 4，乾隆三十二年七月甲子條。

⁸²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67，頁 32-33，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條。

化對旗人作用力日益增強的年代，仍能保持良好的滿洲傳統。但是，他們也不可避免地「沾染漢俗」，例如：傅恒「將傅字姓其諸子」，乾隆皇帝下令改作「福」字；阿桂父阿克敦，子阿迪斯、阿彌達，「雖俱係清語，究屬三代沿用，恐其家遂以阿為姓」，亦令其孫不必沿用，「蓋滿洲原有姓氏，而通行乃其名字，今妄效漢姓，不特遺忘根本，觀之亦甚不雅」。⁸³

乾隆皇帝厭惡「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的行徑，⁸⁴遇有宿儒耆學卻頗為優容。例如：大學士鄂爾泰（西林覺羅，鑲藍旗）清、漢文俱佳，長子鄂容安係雍正朝進士，則「不諳國語，上雖督責，然厚加任使，未嘗因一眚以致廢棄」。⁸⁵乾隆二十年(1755)，鄂容安以參贊大臣從征準噶爾，在伊犁與阿睦爾撒納力戰，兵敗自殺，⁸⁶乾隆皇帝於〈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中寫道：「世臣知書，料善論兵。惜弗通語，遂弗燭情。變起倉卒，力戰命畢。用違其材，實予之失」，⁸⁷可見皇帝的哀思與不捨。鄂容安清語荒疏，顯然是受到「習漢書」的影響，但也展現出滿洲尚武的特質，這或許是能得到皇帝包容的原因。另一方面，乾隆皇帝性好作文賦詩，喜以書生自詡，⁸⁸君臣間詩文酬和往來頻繁，惟在準噶爾戰爭中貽誤軍機遭革職懲處的舒赫德，有「每日記事作詩」的習慣，卻遭斥責是「漸染漢人習氣」，⁸⁹則皇帝對雅好文學的旗員的態度，又因人、因事而異。舒赫德是徐元夢之孫，康熙皇帝曾盛讚徐元夢的清、漢文造詣，曰：「現今學繙譯者，無能過之」；⁹⁰在家學的薰

⁸³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62，頁 34，乾隆四十三年七月辛丑條。

⁸⁴ 清高宗撰，〔清〕梁國治等校錄，《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四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卷 59，〈五督臣五首·故大學士前兩江總督尹繼善〉，頁 15。

⁸⁵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重讀書人〉，頁 16-17。

⁸⁶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卷 319，〈鄂容安傳〉，頁 9127-9129。

⁸⁷ 清高宗撰，〔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御製文初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卷 30，〈贊·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原參贊大臣三等襄勤伯總督鄂容安〉，頁 5。

⁸⁸ 參見孫文良、張杰、鄭川水，《清帝列傳·乾隆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 323-325。

⁸⁹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91，頁 20，乾隆二十年六月丙寅條。

⁹⁰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4，〈大臣畫一傳檔正編十一·徐元夢〉，頁 1009。

陶下，舒赫德亦以「善譯」聞名，號稱乾隆朝無能出其右者。⁹¹以此觀之，即便舒赫德有「漢化」的事實，仍保持極佳的滿洲傳統。因此，皇帝對大臣的讚揚或斥責的背後，都有特定的原因，八旗官員為謀個人的仕途發展，以及與漢族官員交遊應酬，其實也都各自形成一套屬於個人對文化的選擇與調適的模式。

五、結 論

「滿族漢化」，是清史研究上的重要議題，「滿族」的成員，滿洲、蒙古或漢軍各個族群，皇帝、官員或兵丁各個階層，面對漢文化或許是採取一種「各取所需」的態度，研究者也是以「各取所需」的方法來完成各自的論證。在這個研究主題中，學者們已經提出各種不同的解釋模式，今天在研究上所遭遇的瓶頸，不在於研究理論的欠缺，而在於如何將這個主題的概念具體化，或是得到比較準確的認知。

以往的研究成果，經常是根據上諭宣示的政策，論證「滿族」沒有「漢化」；或是根據上諭對旗人的斥責，說明「滿族」已經「漢化」。這兩類上諭的內容，出現在順治朝到道光年間，咸豐朝以後幾乎未見皇帝有相關的論述。可以確定的是，問題並未消失，然是否已經沉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由於嘉慶朝以後的研究近乎空白，尚有待開發。從史料形成的角度來看，以皇帝指責旗人「漢化」的上諭為例，皇帝頒布上諭，有特定的情境與動機，研究者並未深入了解，只是直接引證而已；上諭的內容，除針對個別官員之外，其他大多沒有指出對象，研究者就直接認為是普遍對象；皇帝的資訊來源，是透過官員的奏報，研究者也沒有去分析官員的報告是否就是普遍現象。然而，就紀錄而言，只有特殊現象才會被留存。以旗人火葬父母為例，僅見於江南道監察御史常祿的奏摺，這只是常祿個人的感受，還是當地旗人特有的行為，或是全國的普遍情形，尚不得而知；是否因其他官員見怪不怪，或是相關奏摺已經流失而未留下較多記

⁹¹ [清]錢儀吉纂，《碑傳集》，冊3卷22，〈雍正朝宰輔·太子少保禮部侍郎徐公元夢行狀·陳兆崙撰〉，頁726。

載，也不清楚。可確知的是，這項習俗經過乾隆皇帝頒發〈旗民喪葬禁令〉之後成爲通則，但倘若只根據這條法令進行回溯，不免會判斷爲普遍現象。是以對於「漢化」案例的史料解讀，可能要更謹慎一些。

「滿族」成員面對漢文化的衝擊，就族群而言，滿洲、蒙古、漢軍大約都無法倖免，只是在趨勢上有程度深淺、速度快慢的差別；受影響的層面，則會因居住環境而有所不同。就階層而言，站在頂端的皇帝，或許如同西方學者所說的，是扮演一種「兩面人」的角色。⁹²皇族成員的傾向，與官員接近，爲了個人的前途，必須設法堅持民族傳統，而皇族直接面對的是來自祖宗家法的壓力，但是每個人的認知未必相同；對官員而言，則是個人選擇或自我要求。基層的兵丁，大概禁不起物質文明的誘惑，制度上、心理上的文化防線，隨著時間也就逐漸瓦解。

因此，對於不同族群、不同階層的「漢化」現象，究竟是普遍情形抑或個別差異，似乎可以重新思考。研究者或許可以透過若干個案的討論，逐一進行檢視，當累積到相當成果之後，「滿族漢化」的問題，大概能夠得到進一步的釐清。

⁹²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347.

徵引書目

一、檔案資料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 14。北京：中華書局，1987。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 神田信夫、松村潤、岡田英弘譯註，《舊滿洲檔·天聰九年》，冊 2。東京：東洋文庫，1975。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輯 32。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
-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卷 275、296、319、475。台北：國史館，1986。
- 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冊 16。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

二、官書典籍

-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25、61。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6、84、90。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63、111、115、131。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 121。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6、485、491、788、967、1062、1434。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
-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269、356。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允祿等奉敕編，《上諭旗務議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
-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1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昭 榘，《嘯亭雜錄》，卷 1。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徐珂編著，《清稗類鈔》，冊 8。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高宗敕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瀋陽：遼瀋書社，1989。
- 清高宗撰，〔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御製文初集》，卷 3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 清高宗撰，〔清〕梁國治等校錄，《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四集》，卷 5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 〔清〕鄂爾泰等修，李洵、趙德貴點校，《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 〔清〕福 格，《聽雨叢談》，卷 1。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劉體仁，《異辭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 〔清〕錢儀吉纂，《碑傳集》，冊 1 卷 2、冊 3 卷 22。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鐵保等奉敕纂修，《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三、專書

- 《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遼寧省編輯委員會編，《滿族社會歷史調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
-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
- 定宜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邱永君，《清代滿蒙翰林群體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
- 孫文良、張杰、鄭川水，《清帝列傳·乾隆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 張杰，《清代科舉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 郭松義、李新達、李尚英，《清帝列傳·清朝典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 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
- 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四、論文及專文

- 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入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
- 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中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129-136。
- 王鍾翰，〈「國語騎射」與滿族的發展〉，《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1982年第2期，頁22-28。
- 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收入氏著，《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
- 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著，常書紅譯，〈八旗漢軍的起源與內涵新見〉，收入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輯7。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 徐凱，〈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內高麗姓氏〉，《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2000年第5期，頁62-73。
- 張杰，〈清代尚賢殊卷所見蒙古旗人的社會生活〉，《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頁35-39。
- 張杰，〈清代八旗滿蒙科舉世家述論〉，《滿族研究》，2002年第1期，頁37-39。
- 張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漢化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38期5，2006年9月，頁3-7。
- 莊吉發，〈從數目名字的演變看清代滿族的漢化〉，收入氏著，《清史論集（六）》。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 莊吉發，〈參漢酌金——從家譜的纂修論清代滿族文化的變遷與適應〉，收入氏著，《清史論集（十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 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頁24-35。
- 陳捷先，〈清代滿族婚俗漢化略考〉，《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期15，1990年12月，頁207-215。

- 陳捷先，〈從清初中央建置看滿洲漢化〉，收入氏著，《清史論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 鹿智鈞，〈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研究的回顧與討論〉，《史耘》，期 14，2010 年 6 月，頁 125-175。
- 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2，2004 年 6 月，頁 89-120。
-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6，2006 年 12 月，頁 153-192。
- 葉高樹，〈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8，2007 年 12 月，頁 69-151。
- 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收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編，《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7。
- 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上冊，1968 年 10 月，頁 255-279。
- 管東貴，〈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3 本第 3 分，1971 年 11 月，頁 445-488。
- 劉世珣，〈評介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耘》，期 14，2010 年 6 月，頁 177-192。
- 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86-93。
- 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台北)，卷 24 期 2，2006 年 12 月，頁 1-18。
- 潘洪鋼，〈由客居到土著——清代駐防八旗的民族關係問題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2006 年第 1 期，頁 74-80。
- 滕紹箴，〈「滿洲」名稱考述〉，《民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頁 70-77。
- 賴惠敏，〈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故宮學術季刊》(台北)，卷 21 期 1，2003 年 9 月，頁 101-134。
- 賴惠敏，〈從杭州滿城看清代的滿漢關係〉，《兩岸發展史研究·明清史專號》，期 5，2008 年 6 月，頁 37-89。
-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頁 21-44。
- 戴迎華，〈冠姓、更名、改籍與民初旗民身份變化〉，《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10 期 5，2008 年 9 月，頁 51-55。
- Guy, R. Kent.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 February 2002, pp. 151-164.
- Ho, Ping-t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February 1967, pp.189-195.
- Rawski, Evelyn S.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November 1996, pp. 829-850.

Several Questions on the Study of Manchu Sinicization

Yeh Kao-shu^{*}

Abstract

How the Manchus, who established a new empire and dominated China for two hundred and sixty-eight years, “sinicized”—and even if they were “sinicized” at all—have long been a major concern to scholars of Qing studies.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clarify who were the real “Manchus,” who were “sinicized,” and how they were “sinicized.” The so-called “Manchus” have been equated with “bannermen” in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and in recent scholarship.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ethnic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Eight Banners as well as the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culture of its three groups: the Manchu, the Mongol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Banners. Moreover, owing to different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garrison areas,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varied. Bannermen must also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at least three layers: royal members at the top, officials in the middle level, and ordinary soldiers at the bottom. Members of different levels were affected by Chinese culture to different degrees; hence we should not generalize on the basis of single cases. Further research must determine whether individual cases of sinicization represent entire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lasses. The results of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must be collated, with due attention to their specific ethn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as the basis for more concrete conceptualizations of “Manchu sinicization.”

Keywords: Manchus, sinicization, bannermen, Eight Banner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